

现代国外经济学 论文选

第十五辑

商务印书馆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五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XIANDAI GUOWAI JINGJIXUE LUNWENXUAN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十五辑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40-3/F·110

1992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12千

印数 0—1400册

印张 18 1/8

定价: 5.80元

编者的话

在中国,也许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了解甚多,而对激进政治经济学(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知之甚少。事实上,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发展起来的学派,其影响正在扩大,在不少大学,已被列入研究生课程。尤其是在美国,一批激进政治经济学家近年来异常活跃,他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颇为深刻。

激进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内容广泛,文献不少,但迄今尚未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我们选编这本文辑旨在向读者介绍比较有影响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观点,以便使大家对这个学派有一定的了解。本文选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副所长张蕴岭同志负责选编并组织翻译的。在选编过程中得到美国加州大学岸边分校维克托·利皮特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为了使读者对激进政治经济学和本文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皮特教授专门写了一篇综合介绍性的文章。

我们相信,本文选的出版能为我国读者全面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派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目 录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美]维克托·利皮特 (1)
权力、财产与阶级.....	[美]理查德·沃尔夫 (16) 斯蒂芬·雷斯尼克
不平等的增长	[美]莱斯特·C.索罗 (46)
福利改革:没有围墙的工场.....	[美]特里萨尔·阿莫特 (58)
目前的经济危机:原因与意义.....	[美]安瓦尔·谢赫 (67)
美国经济周期特征的变化.....	[美]霍华德·J.谢尔曼 (81)
力量、积累和危机:战后积累社会 结构的兴衰.....	[美]戴维·M.戈登 托马斯·E.韦斯科夫 (102) 塞缪尔·鲍尔斯
对帝国主义、第三世界以及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激进分析.....	[英]基思·格里芬 约翰·格利 (124)
经济发展中的剩余概念	[美]维克托·利皮特 (198)
农业均衡增长的制度及组织结构	[美]A.R.科恩 (224)
金融理论与第三世界	[英]劳伦斯·哈里斯 (234)
关于不发达条件下的发展	[美]罗伯特·布伦纳 (254)
负债增长与金融创新:美国及拉丁 美洲的不稳定之路	[美]罗伯特·波林 (266)
国际债务与银行业:总危机内不稳 定性日益增长.....	[美]阿瑟·麦克旺 (287)
债务危机的原因.....	[美]谢里尔 佩耶 (316)
激进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	[美]戴维 M.科茨 (331)

“市场社会主义”及其批判	[英]阿历克·诺夫 (345)
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	[比]欧内斯特·曼德尔 (367)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美〕维克托·利皮特

现代经济学的起源通常可追溯到 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的出版。斯密这一著作的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显示出他所关心的事物的广度。确实，在斯密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著作出版后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家始终关心的是广泛的社会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国家的繁荣昌盛，以及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对于他们来讲，适当的制度安排问题和经济与其他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从斯密到马克思(1883年去世)这一历时长久的古典经济学的年代里，经济学家从特征上把自己看作是政治经济学家，并将其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

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出现了边际分析，边际效用的概念占据着显著地位，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随之诞生。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广泛的社会问题转移到较为狭窄的限定的事物方面，最典型的是在被当前称为微观经济学的领域内与最大化问题有关的那些事物。经济学家离开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和制度问题，而注视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试图详细说明他们能够如何分配资源以使其福利或财富最大化。“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被“经济学”所代替。对经济整体以及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含意的严肃考察不再流行，直到 30 年代的大萧条，人们才重新意识到西方世界的制度结构不能被理所当然地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 1936 年出版了《就

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的主要发现涉及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惬意假设的不恰当，即认为经济衰退会自发地产生出带来复苏的足够动力。凯恩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均衡状态可以在大大低于人员、资源和生产能力充分使用的情况下持续存在。他强调了在恢复和保持充分就业中总需求的作用，以及在确保具有足够的总需求方面公共政策的作用。他的著作导致关心宏观经济问题的复兴，进而从充分就业扩展到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或者国民财富。

在 50 和 60 年代，不难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相信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处于稳定地控制之中。按照凯恩斯的处方，增加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或者减少总需求以抑制通货膨胀，这些经济学家相信，通过适当的公共政策手段来“仔细调整”经济，可以减缓资本主义的最严重问题。一般说来，美国的战后时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失业和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市郊化和低利率有助于维持家庭用品方面的巨大增长。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可能适宜于产生对美国资本主义激进的批评。确实，除去保罗·巴兰这一例外，在 50 年代的美国校园里不可能找到一个明显的激进经济学家。

在 60 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民权运动和城市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骚乱揭露出美国繁荣下丑恶的一面。对种族主义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意识迅速增长。在 60 年代中期，对越南战争的抗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激进知识分子重新开始活动，1968 年成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 (URPE)。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开始发行自己的杂志——《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目的在于探索主流新古典主义杂志故意忽视的一系列问题。到 70 年代中期，激进政治经济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严肃的知识分子。

战后四分之一世纪繁荣的终结，滞胀的出现以及衰退的严重

性的增加，在 70 年代里，使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超出了社会正义问题和帝国主义走向危机的理论。在所有各派经济学家都重新显示出对经济周期关心的时候，激进经济学家尤其注重这一领域，结果是既丰富了在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文献中危机理论的遗产，又预期了危机会破坏传统的资本主义秩序，并为一个更加正义和人道的社会的出现铺平道路。

在经济分析中对社会正义的关心、制度变革的强烈意识以及国家和阶级作用的结合，或许是激进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最重要特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坚持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体决策单位方面，并把强调经济学学科的科学特征发展为一种偶像崇拜。相应地，主流经济学变得更加依靠以演绎方式进行的数学分析，即在给定的某种假设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典型性地试图用数学方式来演绎出那些假设的确凿的含意。新古典主义的实践者们对数学的应用往往是极为精深的。

然而，在经济学中使用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事实上那些最初的假设经常是不合常理的，同时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被任意地排除掉了。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典型地从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开始进行分析。

现在，如果我们考察个人行为，毫无疑问，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确实是其主要关心的事情。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是唯一关心的事情。人类的动机是极其复杂的，而人毕竟是社会实体。人们的行动出于习惯，他们受到制度力量的限制，他们显示出利他主义和关心他人，他们对幸福的观念与周围其他人的状况密切相关。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简单化假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使得这种行为服从于复杂的形式分析，但同时造成了这种分析仅仅勉强与现实世界中的行为相关联。

与此相对照，激进政治经济学认识到社会制度的转移特征和

可变性,并试图发展一种对经济行为的分析,这种分析坚实地植根于人类行为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之中。由于总是关心社会正义方面的情况——一个没有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失业、过分的不平等和专横的等级制度的世界——激进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世界出现的时候,它是建筑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分析的丰富传统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它试图将两者结合以提供一种更令人满意的结构,用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变化。

按照这种观点,“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用词不当的术语,因为不能认为它是一种政治的经济学——至少不是这种术语的狭义观念。相反地,从这一术语的最广义观念看,它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学。它探索人们的经济活动和产生这些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结合考察从社会生产关系到被种族、性别、阶级划分所分裂的民族国家(和世界)中经济正义的含意等一系列事物。或许“社会经济学”这一术语更加合适,但是我们将仍然使用更为通用的说法,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简单的称为“政治经济学”。

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学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因此,毫不奇怪,在政治经济学的写作传统中,人们经常更多地从其他学科而不是从经济学来对待他们的研究。所以尽管政治经济学归属于经济学,但并不难于发现人们从与其相联系的学科的观点来看待政治经济学,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人类学等等。本书挑选的论文反映了这种多样性。大多数的作者是经济学家,但作者中也包括: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社会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历史学家;谢里尔·佩耶,政治科学家。

在50年代,你可以用一只手的手指来计算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的数目——实际只用一个手指。正如我们已提到的,那是保罗·巴兰,在大学管理当局意识到他的激进观点以前,他受雇于斯

坦福大学。由于巴兰是按照任职期制受雇的，大学管理当局不能毫无困难地将其除名，但管理当局用各种方法来刺激他离开大学，如拒绝提升和增加薪水。巴兰的主要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于1957年出版，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最适当的起点。该著作充满了敏锐的洞察力，包括对经济剩余概念的介绍，然而该书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收入本书中的利皮特的文章明确地指出了其缺点。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巴兰在许多方面是孤立地工作着，被剥夺了在其学术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与同辈人进行学术交流的权利；他于1965年逝世，享年54岁。

在60年代里，在影响时代的历史力量的鼓舞下，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一小群激进经济学家。60年代初期的民权运动和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加强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民众斗争，使得许多人对形成美国资本主义基础的那些令人安心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假设表示怀疑。对国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对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和工人的剥削，深入到许多研究生的意识之中，并有助于决定他们的学术方向。对贫穷和不平等的研究第一次在研究备忘录中占据到重要位置。正如我们已提及的，1968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诞生了，这是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的第一个专业性协会。该联盟的杂志《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始终是这一领域内的最主要杂志。

在70和8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数目显著增加，其学术研究范围扩大。在本书编写的时候(1989年)，在美国的大学里找到一、两个激进经济学家是很平常的事情。课程方面的歧视依然存在，许多大学故意排斥他们，而其他院校默认他们的象征性存在。在他们的录用和提升方面要求特别苛刻。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一直被那些古老的、有既成体制的大学有计划地拒之门外，但是，一些这类的课程已经出现了。强调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主要课程设置在阿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纽约市的新学

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岸边分校、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通常被认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教纲是设置在阿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而发展最迅速的（以专注于发展经济学而著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岸边分校。圣母玛丽亚大学（印第安纳州，南本德）也显示出对政治经济学不断增加的重视。

西方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吸收了两个丰富的传统：一个是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另一个是传统的经济学。不象原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那样强调从明显的事实来推演出结论，且又经常脱离现实世界中迫切的经济问题，激进政治经济学格外关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并毫不困难地利用由主流经济学分析所发展起来的经验工具。然而与此同时，它对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关心，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考察，以及将类似阶级和国家等变量结合进行分析的意愿，提供了一种远比主流分析更为丰富的解释经济现实的理论结构。

在西方，关于社会科学的一个特别为人们所喜爱的神话是其学术的“中性”，即认为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并因此与思想意识形态相分离。与此相对照的是，激进政治学家则领悟到在学术和阶级利益之间存在着联系，认识到一定的社会结构要象使用其他手段一样使用其所供养的知识环境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激进政治经济学对那些受损害和受压迫的人们的关注是其另一个本质特征，在迄今为止所产生出的丰富学术文献中明确表达出这种关注。

本书收录的论文始终是依照着阐明激进政治经济学文献的范围、丰富性和深度的观点来进行挑选的，当然也建立在各篇论文的优点的基础之上。某些论文的选择是为了显示文献中不断发展的辩论；确实，西方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朝气蓬勃的辩论为其特征。我们提供了辩论双方的文章，但几乎不需要强调，我们绝不赞

成其中某些文章的论点。

收录的论文中涉及到阶级、不平等和福利问题。传统文献中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完全不考虑阶级。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多年来一直合作研究，提出了一种严密的阶级概念，这种概念可以系统地应用于经济分析。在《知识和阶级》(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他们对此作了全面的解释。他们的研究基础是对马克思的解释，他们认为，对阶级这一概念最好理解为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名词。他们把传统的阶级用法——工人、资本家、地主等等——看作是一种近似值，指出取而代之的恰如其分的中心点应该是多阶级和非阶级的过程，这些过程相互影响，从而改变或确实形成了社会实体。

根据沃尔夫和雷斯尼克的分析，人们普遍地参与各种各样的阶级过程。他们的研究工作对那些把阶级看作是确定的、已经证明的群体的更具有传统的激进分析形成了挑战，也对那些把个人看作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独立单位的传统新古典主义分析形成挑战。

莱斯特·索罗是麻省理工学院管理研究生院的院长，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激进经济学家。然而他对不平等和贫穷问题的关心以及他对减轻这些问题的信念，使得他的某些著作适合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从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到索罗、从马克思主义分析到非马克思主义分析、从理论分析到经验性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立刻看到激进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广度。与索罗一样，特里萨·阿莫特的论文也集中于经验性资料和政策问题。其论文探讨了保证最低生存需要的福利政策的失败这一特殊案例，她的分析揭露了美国许多福利政策的伪善，这种政策对特权的保护优先于减轻苦难。

本论文集反映了关于美国经济中各种危机的不同的激进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经济标志是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和温和的衰退,到70年代这种状况终于结束了。在70年代和8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地放慢了速度,而同时衰退和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由于出现了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的相对停滞,“滞胀”这一术语得到广泛的使用,这种结合与凯恩斯主义把通货膨胀与过度总需求连结在一起的传统假设是相互矛盾的。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达到了双位数水平,而在80年代初期,由联邦储备局审慎地制造的两次严重衰退,对于把通货膨胀压力降低到容易管理的水平是极其必需的。从1972年到1985年,美国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4.1%,这与1945年到1970年期间的年增长率大不相同。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种形势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中重新激起对危机理论的兴趣,危机理论这一术语从传统的对经济周期的考察扩大到对在资本主义经济和长波中(大约50—60年的时期,其中包括若干相对繁荣的10年及随后若干停滞或衰退的10年)存在的长期停滞倾向重新产生兴趣。几篇论文反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考察。安瓦尔·谢赫的论文论证了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不能表述马克思主义定义中关于利润的严格概念,作者对传统资料进行了调整以便得到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利润,并把停滞倾向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确定联系起来。霍华德·谢尔曼的论文在方法上则完全不同,谢尔曼对战后初期的衰退与后期的衰退进行比较,指出70和80年代的较深刻危机是与总需求和其实现方面的问题的加深相关联的。

戈登、韦斯科夫和鲍尔斯撰写的论文反映了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对长波理论更新的兴趣。在论文中他们介绍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其核心论点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内会理所当然地实现积累，而需要一种稳定的支持性的制度性结构(积累的社会结构)。一旦建立起这种结构，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段延长了的相对繁荣和扩张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衰退倾向于变得温和。然而最终，当生产力的发展与支持这种发展的制度性力量产生尖锐矛盾的时候，这种独特的、具有历史特征的促进积累的制度性安排就走向终结。随后是一段或多或少延长了的危机时期，直到产生新的制度性安排以维持积累进程。

积累的社会结构方法反映了政治经济学对制度性结构的重视和在推动经济变化中出现矛盾的作用。确实，与传统的经济分析强调均衡相反，政治经济学倾向于强调所有均衡的暂时性，和不断产生的导致变化的压力。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一直在美国得到最广泛的发展，但在法国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理论动态，法国的“管理学派”，尤其是阿兰·利皮兹的研究工作，也把长波与有利于积累进程的制度性结构的产生联结在一起。

激进经济学对劳动力和歧视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内容广泛的激进文献，其论题范围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到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形式。比如，理查德·爱德华兹的著作《竞争的领域》就解释了劳动市场分裂这一核心概念。在美国，并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劳动市场，工作可以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划分：二级的、附属一级的和独立一级的。每个部门具有自己的控制工人的机制，有自己的提供机会或减少机会的独特形式，等等，而在部门之间流动的机会相当有限。

在种族和性别歧视领域内也有着丰富的文献，这些歧视是美国和其他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本质特征，而它们尚不能在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范例中轻而易举地得到解释。如果黑人和妇女工人与他们的男性白人竞争者具有同样好的质量，而在类似的工作中却报酬较少，那么，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似乎应该更愿意

雇佣黑人和妇女，因为企业从而可以获得超过其竞争者的成本优势。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最初的工资差异就会趋向于消失。然而在实际上，这一切并未发生。歧视待遇反而变得制度化了。迈克尔·赖克的《种族不平等》一书就认为资本家从工人阶级的分裂中得益。通过使某些集团的工人反对另一些工人，他们能够削弱工会的力量和减小对其控制劳动过程的挑战。在分别对待妇女的情况下，雇主可以通过拥有一群受企业条件支配而比较容易雇佣或解雇的工人获得额外利益，对这些工人可以毫不困难地拒绝给予在“正常的”雇佣状况下经常要付出的全部利益。妇女和像黑人等少数民族通常得到的是属于二级劳动市场中的工作。

在经济发展领域内，政治经济学文献是格外丰富的。在国家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由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问题再一次涌现出来：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国民财富？不过在目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为这一讨论增加了新的内容。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发展？本书收录的几篇论文提出了这个问题。

为了反映发展领域内的著作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挑选的论文中的两篇代表了对两种截然不同观点所作的评论性调查。基思·格里芬和约翰·格利的论文评述了有关讨论帝国主义、发展和第三世界的激进经济学的文献。劳伦斯·哈里斯的论文是专为本书所作，他提供了关于欠发达国家的金融理论的评论性考察。他的研究既包括了传统文献，也包括了激进的/批判性的文献。

利皮特的论文指出，在传统的分析中系统地排除了“阶级”和“剩余”的概念，因而排除掉了决定经济发展能否进行的最关键因素，以及经济发展以后的发展过程的特征。论文从保罗·巴兰观

察到的现象开始，即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发现自己是贫穷得不能参加战争或建筑纪念碑。利皮特指出，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存在着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剩余。他论证了那些控制着剩余的统治阶级总是以他们认为能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方式来处理剩余。对剩余的某种用法可以维持发展过程，而其他方法则会阻碍发展。

格里芬从事研究的问题是，高人口密度和迅速的人口增长是否是不发达的最根本原因。在调查了12个亚洲国家后，他证明了在贫穷条件下的发展和高度的人口密度或人口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着统计学的相关性。其论点的含意并不是说高人口密度或人口增长促进发展——它们明显地不促进发展。更确切地说，其论文建议必须从那些促进或阻碍发展进程的社会安排中寻找不发达的最根本原因。阿齐泽·拉曼·卡恩研究了经济发展中集体化的作用这一问题。他从创造一种有助于收入和财富相对平均分配的土地所有制结构以及从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角度指出，集体化并不比彻底的土地改革提供更多的利益。

经济学中的传统分析把不发达看作是表示“尚未发达”。根据这一观点，在一、两个世纪以前，西方的某些国家开始增加其国民收入中专门用于储蓄和投资的份额；这些国家进行了一场工业革命。按照传统观点，第三世界国家只需要追随着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开辟出的道路前进就可以了。60年代，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指出从16世纪资本主义出现开始，正是那些在西方国家中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同种力量，造成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不发达。按照弗兰克的观点，无论是通过掠夺还是贸易机制，西方国家有计划地从第三世界国家榨取剩余，在促进西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同时，剥夺了第三世界国家维持其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简言之，在弗兰克的结构里，过去四个世纪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进程已经造成了世界经济中某些部分的发达而使其余部分